



魏  
晋  
南  
北  
朝  
史  
论  
文  
集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



# 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

齐 鲁 书 社

**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237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50

ISBN 7-5333-0169-2

---

K·23 定价：5.00 元

## 目 录

### 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

- 代序 ..... 黄 烈 ( 1 )
- 魏晋时期盐铁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 陈连庆 ( 7 )
- 六朝时期荆州地区的人口 ..... 黎 虎 ( 32 )
-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汉地区的水利建设 ..... 袁纯富 ( 56 )
- 孙吴时期的浙江社会经济 ..... 黄佩芳 ( 67 )
- 孙吴毗陵屯田的性质 ..... 陈玉屏 ( 81 )
- 西晋“两类郡县农民”说榷议 ..... 周国林 ( 86 )
- 魏晋官制中的护军 ..... 冯君实 ( 102 )
- 东魏北齐兵制概论 ..... 杨耀坤 ( 119 )
- 北魏中书学及其政治作用 ..... 严耀中 ( 136 )
- 魏晋南北朝政界名人成才年龄结构剖析 ..... 朱大涓 ( 149 )
- 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研究 ..... 施光明 ( 166 )
- 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 ..... 刘 驰 ( 178 )
- 净人新探 ..... 谢重光 ( 193 )
-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发展 ..... 黄佩谨 ( 213 )
- 建平蛮、天门蛮、临江蛮兴衰述略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家族先民 ..... 刘美松 ( 235 )
- 秃发、拓跋“分姓”目的辨析 ..... 汪福宝 ( 251 )
- 西晋名教之治与放达之风 ..... 景蜀慧 ( 260 )

云岗昙曜五窟的帝王象征·····	赵一德 (275)
魏晋南北朝的书籍文化·····	李瑞良 (289)
六朝浙江方志的特点·····	王志邦 (304)
刁凿齿评传·····	刘静夫 (322)

# 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

## —代序

黄烈

魏晋南北朝史是以王朝断代的历史，历史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评价。例如持魏晋封建论的同志，以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点；持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的同志也把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有的阶段；搞控制论的同志把它当作一体化调节失灵的时期。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究竟有没有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它不同于其他断代史究竟有那些特点和新的因素？这是关系到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宏观研究、微观研究都不可忽视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史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时代。我们认为，它的特色在于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这些新鲜事物不仅影响当代，也影响后代。作为时代的特征，主要有三项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 一、中国文化结构的改变

文化应包括文学、艺术、礼俗、宗教、思想、科学技术等等众多的内容，但它又不是多种人文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诸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浸透形成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旧的因素逐渐丧失，新的因素逐渐增加，从而改变着自己的文化面貌。如果说中国固有文化有相对的稳定性的

话，那么我们从中找出它的变异性也许更为重要，因为，新的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力往往更为重大。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新文化因素滋长较多的时期。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取得了独尊的正统地位，形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但随着儒学地位的巩固，儒学本身陷于停滞僵化的状态，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众多的儒生完全在繁琐的章句解说中打圈子。同时儒学又与迷信相结合向谶纬方面发展。古文经学家，虽然反对以上两种倾向，但他们的复古倾向，在本质上并不会导致社会的进步。从魏晋开始儒学受到新的思想力量的猛烈冲击，从而改变了西汉以来儒学独尊的局面。新的冲击源来自三个方面：

**玄学的兴起** 玄学的思想核心是道家的老庄之学，魏晋玄学家在思想和行为上都以旷达放荡为特征。他们用玄虚的道理冲击了儒家的六经。玄学本身是一种更高级的唯心主义，由于其冲击了儒家的统治，从而在思想上打破了死水一潭的局面，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为道教佛教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佛教的兴起** 佛教是外来宗教，儒学居于统治地位的两汉，佛教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进入魏晋南北朝才很快地兴盛起来，佛教从教义和形式来说都是新鲜事物，佛教的传播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其冲击力的来源在于佛教的教义和形式都无比丰富，对于已经陷于僵化和停滞的中国封建文化来说，无异注入了新的激素，所以很快就为朝野人士所乐于接受。此外，当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促成了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的发展，满身沾满血污的石虎却在热心提倡佛教，为什么？用石虎的话说：“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响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用兼奉，其夷赵百姓所乐事

佛者，特听之。”（见《晋书·佛图澄传》）原来佛教有助于他建立夷君统治华夏的理论。

佛教与玄学儒学也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东西，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对封建统治来说，正是相辅相成。这也正是佛教得以传播的基础。佛教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远不止宗教信仰一端，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建筑、语言、文学、医药等方面都输入了新鲜的东西，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西交通的意义上以及民族素质的改变上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佛教这种外来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结合有一个过程，同时也有矛盾和斗争，佛教最初是依托在我国固有民间神祠的躯壳上的，这在吐鲁番文书中得到生动地证明，佛寺称祠，僧人称道人。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大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化大开放，它改变了西汉以来封建文化的单一封闭状态，对中世纪中国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道教的兴起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来自民间的驱邪、治病、互助的原始教义，曾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但道教的大发展却是在佛教的影响下从佛教中移植了某些教义和形式之后。北魏道武帝崇尚道教，寇谦之清整道教，使之更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这样道教的发展才得到有力的扶持。道教的民族性质，以及服食治病长寿的实用性质，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道教基本上是与佛教对立而存在的。道武帝提倡道教，北魏诸帝登位都要受道箓。他们正是从道教的民族性质上加以利用而崇道的，与石虎的崇佛可以说是异曲而同工。在魏晋南北朝终于形成了佛、道、儒三家并立的文化格局，这样的格局一直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与秦汉相比，魏晋南北朝在文化上的开放，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又是多么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完全可



以构成文化结构上时代区分的重要界标。

## 二、民族关系的重大变化

我们通常说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四次民族大激荡的时期：春秋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以及清代。民族激荡表现为民族关系复杂化、民族矛盾尖锐化、民族融合加速化。而在魏晋南北朝这些特征都十分突出。这个时期，内迁民族之多，所建政权之众，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在民族迁徙，夺取和建立政权的过程中自然免不了战争和奴役，因而矛盾也是十分尖锐的。但作为这个时期民族大激荡的总后果来说却是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曾在古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一时的匈奴、氐、东羌、鲜卑、乌桓、柔然、羯以及众多的杂胡等都在这个时期先后与汉族融为一体，从而在历史舞台上消声匿迹了。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古代民族的历史终结，它所留下的后果，是隋唐的大一统和唐代开明而开放的新局面。唐太宗是从民族偏见中解脱出来的一个开明君主，但仅仅他一个人开明是不够的，他还有一批开明的臣下。唐代政策的开明和开放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隋唐宗室的婚姻关系，就打破了民族界限，统治集团内部也是各族兼容并包，至于民间，民族界限更为淡薄。形成这样风气的历史渊源，不能不追溯到魏晋南北朝，这正是长期民族融合所带来的积极后果。

## 三、社会经济的新变化

魏晋南北朝比起两汉来，在社会经济形态上出现了许多新特征。从两汉已比较发展的商品经济向自然经济逆转，货币近乎停止流通，以物易物成为交换的主要手段。南北两地区经济

出现逆向差异，北方经济破坏严重，长期在破坏与恢复之间徘徊。北朝的均田制，实行计口授田，不论其施行程度如何，总是对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一次挑战。南方土地大量开发利用，较大规模的多种经营的种植园不断涌现，山林川泽也在开辟，经济呈较大幅度上升，大土地所有制无阻碍地向前发展。阶级结构呈现多层次的复杂变化，较之两汉不仅阶层增多，各种身份复杂，而且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也大大增强。影响阶级结构变化的，除了经济因素本身以外，军事、政治、宗法诸因素的特殊作用不容低估，士族、高门、部曲、役户、士家、营户、隶户等都是军事、政治、宗法影响下的产物，奴隶、半奴隶的增多，主要也是军事政治原因造成的；宗法关系强化了人身依附关系，大量个体农户向依附者转化。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总的来说，已离开了正常发展的途径，呈现扭曲变形的变态。

以上所举三项，是这个时期所出现的影响比较深远的显著新特点，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新事物，如九品官人法、占田课田制、宗主督护制、府兵制等等，但这些都归入上列三项中作为派生的或因果的产物。魏晋南北朝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特征，并不是在正常社会经济发展下所出现的必然过程，而是一种被巨大的人为力量所扭曲了的社会变态，造成社会变态的原因是沿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汉族人口大量转移，长期战乱造成人口损失流亡，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等所带来的系列后果。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确实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时期，无论在宏观研究或微观研究中都是中国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当前摆在历史学者面前的任务是，怎样使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向更新的境界发展？怎样发挥魏晋南北朝史的社会功能和效

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辑这本论文集，正是为了抛砖引玉，期待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开拓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局面。

# 魏晋时期盐铁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陈 连 庆

## 一、三国时期盐铁事业的恢复

汉代的盐铁事业，武帝以来由国家经营，于郡国设置盐官铁官，直接隶属于大司农。东汉时期，盐官铁官改为郡县的属官。和帝时一度废止官营，后来又恢复了。不知何时又由使者专卖，有的地方又设置专官。这是两汉时期盐铁事业的概况。

曹氏政权控制食盐，始于官渡战前。曹操使卫觐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卫觐通过荀彧向曹操建议：

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枝之利也。太祖从之。<sup>〔1〕</sup>

卫觐建议由国家控制食盐，用这笔收入作为经营关中的资本。

《卫觐传》没有说明专管何地之盐，但是卫觐是河东安邑人，熟悉河东盐池的情况，而当时曹操所能控制的只有河东盐池。传中所说“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就是派遣专职人员管理河东盐池，这一点胡三省已经指出。盐池的具体收入，史不详

载。据《魏书》卷二五《长孙道生传》附《长孙稚传》所记河东盐池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绢帛三十万匹，相当于冀、定二州的全年收入。虽然时代不同，也可以作为参考。魏晋时期这个盐池始终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官渡战后，曹氏政权开始控制海盐。徐干的《齐都赋》认为经营海盐是一笔“大利”〔2〕，明帝时徐邈为凉州刺史，建议整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3〕。武威、酒泉盐池，即今河西走廊一带内陆盐湖。从以上的材料看，曹氏的控制食盐是逐步实施的，最初仅限于河东盐池，以后才扩大及于全国，它的管理机构，除调者仆射外，大约沿袭汉代之旧，产地和产量却大大缩小了。

巴蜀一带，采盐事业似由豪强大姓和少数民族酋长垄断。蜀汉政权建立之后，才改由国家经营。《三国志·吕乂传》云：

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后校尉王连请乂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干等并为典曹都尉。

同书《王连传》云：

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材以为官属，若吕乂、杜祺、刘干等，终至大官。……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领盐府如故。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蜀汉设置盐府校尉，始于刘备定益州，即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盐府校尉是总管，下面还设有典曹都尉。王连是一位得力干将，但不一定是第一任校尉。王连以蜀郡太守，兼领盐府，可见盐府校尉即设在成都。盐税是国家的重要收入，盐府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机关。

据《华阳国志》所记，蜀郡成都，从秦惠王二十七年（前

280年)以来,即有盐铁市官并长丞(见同书蜀郡成都县条),巴郡起码自东汉以来盐铁五官各有丞史(见同书巴郡条)。西汉宣帝时“穿临邛(今四川邛崃)、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临邛县有盐井及火井。广都县(今四川双流)“有盐井渔田之饶”,其盐井开采,始于秦代的李冰。犍为郡南安县(今四川乐山)，“汉有盐井”,江阳郡江阳县(今四川泸州)“有富义盐井”,西汉时未见记载,东汉崔骃作《博徒赋》始胜讚“江阳之盐”。越嵩郡定笮县(今四川盐源)“有盐池,汉末夷皆锢之”,太守张巖往争,杀夷帅狼岑等,改由国家经营。从此以来,“官迄有之,北沙河是”〔4〕。建宁郡有“盐池田渔之饶”。同郡连然县(今云南安宁),西汉时设置盐官,其地“有盐泉,南中共仰之”〔5〕。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为哀牢夷故地,自东汉明帝以来,邑豪岁输盐一斛,以为常赋,〔6〕《华阳国志》记载云南郡蜻蛉县(今云南大姚),“有盐官”。云南郡系蜀汉时从永昌郡分划而成。巴郡临江县(今四川忠县),“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此地西汉时未设盐官。说者以为东汉始置,其说可信。巴东郡胸忍县(今四川云阳)西汉时即有盐官,此时亦“有盐官”。巴西郡南充国县(今四川南部),“和帝时置,有盐井”。

章山之铜,东海之盐,是吴王濞与汉朝抗衡的政治资本,也是江东政权与曹氏政权角逐的经济支柱。曹操乘官渡之战战胜之余威,下书责孙权质子。孙权召集群臣会议,周瑜说:

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有何逼迫,而欲送质。

在重要关头，要把铜和盐搬出来，和敌人比一比。对于这等重要物资，国家不会不进行控制的。江东的产盐地区主要是海盐（今浙江海盐）一带。吴时在这里设置司盐校尉。《水经沔水注》云：“谷水又东南迳盐官县故城南，旧吴海昌都尉治。谷水石有马皋城，故司盐都尉城，吴王濞煮海为盐于此县也。”海盐是吴王濞以来的采盐业中心，东吴时期也是重要的产盐基地。《三国志·孙休传》云：“永安七年（公元264年）秋七月，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骆秀。”可见吴国也有管理采盐的官吏。长江口以南各地，西汉于番禺、高要设有盐官，孙皓甘露元年（公元265年）于东莞置司盐都尉。见《南越志》。<sup>〔7〕</sup>东莞，今广东东莞。

三国时期，曹操击破袁尚之后，初置司金中郎将，其具体之年当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魏略》云：“河北始开冶，遂以王脩为司金中郎将。”<sup>〔8〕</sup>《魏略》又云：“脩为司金中郎将，陈黄白异议，……太祖甚然之。乃与脩书曰：……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贍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可见王脩确实是第一位司金中郎将。王脩去任之后，著名的后继人是韩暨。《三国志·韩暨传》云：“太祖平荆州，辟为丞相士曹属。后选乐陵太守，徙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文帝践阼，封宣城亭侯。”韩暨加司金都尉，在文帝即位（公元220年）以前，则其担任监冶谒者，不能早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监冶谒者的地位比谒者仆射低，司金都尉也比司金中郎将低。洪饴孙以为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均系比二千石，第四品，不

知何据。《通典》卷三六魏官品中无此官名。韩暨的功绩是把人排（人力鼓风机）改为水排（水力鼓风机），由于这一革新，使效率提高三倍。司金都尉之外，又有司金丞（见《曹真碑》），当是都尉的属官。

蜀汉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见前引《三国志·吕义传》），盐府校尉亦作司盐校尉〔9〕，似乎盐府校尉同时管理盐铁事业。但当时亦有司金中郎将。《三国志·张裔传》云：“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这项记载虽略，但明确指出“典作农战之器”，可见司金中郎将的职权范围以监造农具和武器为主。这就比魏吴两国的有关记录清楚得多。在诸葛亮当政时期，曾经制造“连弩”，“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深受当时人的称赞；又使蒲元于斜谷铸刀，在冶铁技术上有很大地改进。《蒲元别传》云：“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熔金造器，特异常法。”“刀成，以竹筒密内铁珠满其中，举刀断之，应手灵落，若薤生薤，故称绝当世。”〔10〕陈寿赞美诸葛亮，以为“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11〕。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蜀汉的冶铁业，由于上级的提倡，出现过某些能工巧匠，取得很好的成绩。

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成都在秦代已有铁官。蜀郡临邛县（今四川临邛峡）、犍为郡武阳县（今四川彭山）、汉中郡绵阳县（今陕西勉县），西汉时置有铁官。〔12〕巴郡的铁矿，东汉时有铁官。〔13〕这些铁矿在蜀汉时继续开采。《华阳国志》还说：“临邛县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又云：“武阳县，山出铁及白玉。”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卷三三云：“诸葛亮取为兵器，其铁刚利，堪充贡焉。”



此外，蜀郡广都县（今四川双流）“山有铁矿”。越嶲郡台登县（今四川冕宁）“山有磐石，火烧成铁刚利”。汉末被夷族占有，张嶷又把它收回来，改由国家经营。

孙吴的冶铁业也由国家经营。《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云：“江南诸郡县有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反映了吴晋之间冶铁机构的迭遭关系。根据目前仅有的材料，皖南和武昌一带曾是当时的冶铁中心。《三国志·诸葛恪传》说：丹杨地区，“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后来的梅根冶，就在这个地方。《纪闻》云：

吴宣城郡青阳县（今安徽铜陵）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庙居曾阜之巅，林木秀茂，周回十里，土人不敢樵采，敬而事之，日荐蘋藻。娥父，吴大帝时为铁官（原讹作官），冶以铸军（以下疑脱器字）。一夕炼金竭铲而金不出。时方草创，法令至严。诸耗官物十万，即坐斩倍（赔？），又没其家，而娥父所损折，过数千万。娥年十五痛伤之，因火烈遂投于铲中，赫然属天。于是金液沸涌，溢于铲口。娥所躐之（原误作三，今正）履，浮出于铲，身则化矣。其金汁塞铲而下，遂成沟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亿万斤，沟渠中铁至今犹存。故吴俗每冶铜铁必先立祠，享而祈福。〔14〕

按：《纪闻》所载虽属民间传说，语涉神怪，但其中不乏可信成分。第一、梅根冶肇始于吴，与《宋书》的记载相符。铁冶铸造军器，与当时的战争环境相合。“法令至严”云云，与史书记孙权时的政令一致。第二、李娥的父亲身份是吏。吏在汉代后期已是征发服役的对象，和长官逐渐形成隶属关系。孙吴时期，吏有单独的户籍，不但是全家服役的，而且也是世袭